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蘇聯本是世界上唯一能與美國相媲美的超級強權，但布里茲涅夫之後慢慢走下坡。黨治制造成官僚主義盛行、黨政不分、以人治代法治缺乏有效的監督體制、領導階層老年化並缺少流通等弊病叢生，到了 1985 年戈爾巴喬夫上台時，蘇聯已經不再是昔日的光輝帝國，而是一個腐敗，需要徹底改造的國家。戈氏當時面臨外在（東歐共產國家非共化、民主化浪潮、[1]西方國家的壓力等）和內部（國家生產機器趨於停滯，經濟破產、人民生活困苦、黨幹部貪污受賄、社會犯罪問題嚴重等）環境的改變，他是不得不從事由上而下的改革，來避免一場由下而上全面性的革命。[2]在「公開」、「民主」口號下，蘇聯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變革，政治領域的改革和重建導致蘇共喪失國家權力的掌控權，戈爾巴喬夫也失去了統治國家的依據和支持。在改革派與保守派圍攻、加盟共和國紛紛要求獨立，以及社會變革過快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發現他再也無法掌控國家政治的走向。

1991 年 8.19 政變之後，戈爾巴喬夫在同年 12 月底發表辭職演說，蘇聯正式走下歷史舞台，國家主控權轉移到葉爾欽所領導的俄羅斯聯邦政府手上。這位體制的破壞者兼建造者，開始對俄羅斯進行深刻的改造。[3]在經濟改革上實施「休克療法」；在政治方面，從 91~93 年，葉爾欽與議會因爭奪對政府掌控權和國家體制（內閣制或總統制）而陷入激烈的府會衝突。93 年 10 月事件，葉爾欽用武力解散了議會，也打碎了舊蘇聯遺緒，俄羅斯走向新的方向。93 年憲法確定了俄羅斯朝向三權分立與半總統制的發展方向，並在俄羅斯建立了西方議會式民主；[4]但這部爲葉爾欽量身訂做的憲法，賦予總統極大的權限，相對把國會的權力縮減，導致總統權獨大，立法和司法權無法有效制衡的局面，是之後府會衝突不斷以及政治不穩定的主因。顯然地，這位建造者的工作沒有完全成功。雖然人民擁有了自由和民主，但經濟衰退和社會不安卻使人民的生活水準跌至谷底。

1998~1999 年葉爾欽四度易換總理，最後選擇普京作爲他的接班人。但普京並沒有跟葉爾欽一樣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注重俄羅斯的傳統和國情需要，重新宣揚「俄羅斯思想」來建立俄羅斯。普京於 2000 年當選總統，首先利用政權黨在國會中取得多數，消除了葉爾欽時期以來國會掌握在反對黨手中的情況。但也使

---

[1]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他的著作《第三波》提到，1970 年中期開始發生的民主化浪潮，席捲拉丁美洲、亞洲、到最後連共黨統治的東歐國家也開始非共化。

[2] 戈爾巴喬夫曾說過：「問題就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總之，整個社會已經失控，我們是過河卒子，不得不向前，改革的呼聲以在各地醞釀。」

[3] G.W. Breslauer, “Evaluating Gorbachev and Yeltsin as Leaders,” In Archie Brown & Lilia Shevtsova ed., *Gorbachev, Yeltsin, and Putin---Political Leadership in Russia's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2001). pp. 57~60

[4]按照學者吳玉山的研究，俄羅斯政治體制按照憲政結構來說是半總統制，但如果考慮到權力運用和實際事例，應屬於總統制，他甚至形容爲超級總統制。參見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台北：五南出版社，民國 89 年)，頁 63~67。

得國會變成橡皮圖章、反對勢力無法有效監督制衡總統的局面；普京又改革俄羅斯的聯邦制度，將八十九個聯邦主體劃分成七個聯邦區，並派總統全權代表實施垂直監督和管理，「聯盟中央權力一把抓」，改變了葉爾欽時代中央積弱的情形。2004 年普京獲得七成以上的選票當選俄羅斯聯邦第四任總統，他的鐵腕政策和強人作風會把俄羅斯帶往哪個方向？值得我們觀察注意。

本論文把論述重心放在「比較」上，試圖去認識三位國家領導人對於政治改革理念以及改革實踐的不同之處，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比較，釐清三位領導人的改革各自爲俄羅斯政治體制帶來什麼不一樣的影響？他們各自的政治選擇又是帶領俄羅斯朝哪個方向前進？

另外，我們還要釐清國家領導人的性格和意志等因素是如何影響制度運行。俄羅斯的超級總統制把總統放在一個獨特的地位上，使得領導人本身的性格、理念和心理對國家政治走向以及制度本身擁有很大的影響力。[5]這樣的體制對俄羅斯的民主有什麼影響？這些都是這篇論文欲探討的重點。

新制度主義的目的是修正以往傳統制度主義所強調的主權、合法性與正式制度的研究途徑，並提出對非制度要素研究的必要性。透過這篇論文我們可以發現，戈爾巴喬夫、葉爾欽和普京，三位領導人，三種不同的意志、思想和性格，也將國家帶上三種不同的方向。非制度因素對於制度運作的影響可以明顯的觀察到。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在進行研究之前，筆者必須先界定本篇論文的研究範圍。筆者將研究重點放在政治領域改革之上，藉著觀察三位領導人對國家政治體制以及憲政的改革，來檢驗他們執政時期國家政治走向的異同，以及對俄羅斯民主化的影響。因此「政治改革」是本論文研究的學科範圍，其他包括社會、經濟、外交等面向，除了在某些章節略作描述外，並非本論文的研究範圍。

在研究時間範圍上，本文撰寫從 1985 年戈爾巴喬夫擔任蘇共總書記，經過葉爾欽時期，一直到普京執政；由於普京到現今還是俄羅斯的總統，因此本文描寫的時間點會到 2004 年 3 月普京當選第四任俄羅斯聯邦總統爲止。

正如學者歐爾森（M.F. Olsen）所提出，影響國家政治發展走向的因素包括立法功能、行政功能、政黨組織、權力分化、公民影響力五個面向，以及十五個變項（包括工業化、教育程度、交通運輸等經濟、社會、法律各方面）。[6]如果單就

---

[5]這些屬於非正式制度因素。新制度理論不像舊的制度論一般以制度爲研究的主要對象，而擴展到研究非正式的因素。學者 Juan Linz 也提出人格特質等非制度因素對行爲的影響並不一定小於制度。參見吳玉山，「制度、結構與政治穩定」，發表於中國政治學會 90 年年會暨「政治學與新制度主義」學術研討會(2001 年 1 月 6 日)，頁 5。

[6] Marvin. F. Olsen,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政治領域來觀察，似乎無法窺其全貌。然而因受限於本文的結構與篇幅，無法將這些有關政治發展的內容一併討論，是本文的一個研究限制。

語言是研究上的另一個限制。筆者受限於俄文程度不夠，在閱讀俄文書籍和資料時極感吃力，而在俄文文獻的收集上也是一個難題，因為在我國俄文方面的資料相當缺乏，筆者只能向老師們借閱以及多查詢網路資訊。筆者對於俄文資料已經盡力蒐集和研讀，不足之處以英文和中文資料補充，希望能彌補缺憾。

由於研究的主體俄羅斯仍是在發展中，研究的主角之一普京仍然在位，因此其改革的動向及其後續發展比較難掌握和預估，此為本文另一個研究限制。筆者除了盡量蒐集最新資料加以整理探討外，並引用國外重要相關資訊來彌補不足之處，以期對俄羅斯政治走向作一個正確的研究和預測。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本文主要採用「政治文化研究途徑」（The Political-Culture Approach）、「歷史研究途徑」（The Historical Approach）、「制度研究途徑」（Institutional Approach）以及「資料分析途徑」（Document Analysis Approach），來分析並探討從戈爾巴喬夫、葉爾欽到普京的政治體制改革。

一、政治文化研究途徑；依照學者阿爾蒙（G.A. Almond）的論說，政治文化是人民對於所處的政治環境所懷有的情感取向、認知取向和評估取向。若人民對於政治體系的取向是正面的，則該體系因有人民認同而穩定發展；反之，則會危害到該體系的發展。政治文化會隨著歷史背景、社會發展、政治經濟環境等變遷而有所轉變，進而影響整個政治體制的運作。[7]

俄國的政治文化跟其他國家實有大大的差異，一般討論的焦點往往集中在以下特點：[8]

１、廣闊的土地但又冰凍貧寒的特性。
２、專制主義和民間的不能忍耐性。
３、救世主精神與自卑感的複雜情節。
４、大俄羅斯主義和民族自覺的衝突性。
５、東西文化的衝擊。
６、從無政府主義到專制政治的矛盾性。
７、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的疏離。

俄羅斯的政治文化的特點主要來說就是對專制集權統治情結和民主與極權相

---

*Sociological Review(*Albany, N.Y.*)*, Vol. 33, No.5(1968), pp. 699~712.

[7] Gabriel A. Almond, G.B. Powell. Jr.,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8). pp.25~26.

[8] Gordon B. Smith, *Soviet Politics Struggling with Change*(N.Y.: St. Martin's press, 1992). pp.1~15.

互衝擊的矛盾性。戈爾巴喬夫時期雖然開始民主化，但仍是脫不了蘇共總書記的習氣；到了葉爾欽時期，93 年憲法仍舊將總統放在突出的地位上，而俄國人民也依舊選擇了類似其政治文化的的強權總統制度。普京執政後，將原本已經憲法地位突出的俄聯邦總統的權力再度增強，許多西方學者懷疑普京要走回威權主義，不過 2004 年總統大選他獲得了七成的選票支持，表示俄國人民再經過十多年民主政治教育下，仍舊選擇了與其傳統歷史和政治文化相近的強人政治以及威權統治形式。這樣特殊的政治文化值得我們探討研究。

二、歷史研究法；政治發展基本上都有其特定的歷史脈絡可循。此研究途徑主要是從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中，去建立事件的連續性。透過此一途徑，可以組合過去和現在，並預測未來發展。

三、制度研究途徑；此途徑主要用在憲政體制的分析與研究。本文在每個章節中都有專門部分針對憲法本文和修改去比較三位國家領導人政治改革的模式，此一途徑正是用於探討當制度（憲法）建立後，對於政治改革和政治制度發展的影響。

四、資料分析法；是指將所蒐集到之專家學者的著作、人物傳記、理論專書、期刊雜誌和網路資訊等，按時間、年代和章節類別加以區分、整理與歸納來作爲研究的基礎。

本文的架構共分六個章節，第一章是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方法和論文架構以及文獻述評。第二章主要描寫戈爾巴喬夫、葉爾欽和普京的出生、人物性格、改革背景（包括各自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和國際環境等）以及改革理念，並加以比較。本文一個重要論點就是「領導人的性格和意志（非制度因素）對制度運行會產生影響」，因此就三位主角的出生和個性，以及他們的改革理念加以了解是必要的。第三章是就三人執政時期對行政體制改革的比較。其中重點先放在總統制的建立和變革上，再從領導人（總統）對政府人事（主要是總理）的更換以及對政府結構的調整來觀察政府體制的改革，並從中比較三人在總統權限大小和對政府控制強弱，來探討他們的行政體制改革方向；文中也會對三人執政期間的總統大選的過程、結果和操作，做一介紹和討論。第四章是就三人執政時期的立法體制改革來加以比較。第一節的重點是關於立法機關——議會在憲法規定方面的改革，也就是從憲法本文來比較三人對國會的改革；第二節重點是國會的選舉（戈爾巴喬夫時期是人代會，而葉爾欽和普京時期的論述重心是國家杜馬），其中將對選舉法的制定和變更、選舉結果、選舉法變更對選舉結果的影響以及政黨之間的合縱連橫作一詳細討論；第五章是三位領導人對聯邦體制改革的比較，將分爲兩節來論述。第一節主要還是從憲法本文來觀察三位領導人對於聯邦體制的變革，也藉由憲法中所規定的中央－地方關係觀察他們對於聯邦體制建構的構思和理念；第二節從民族問題、處理方式、總統對聯

邦體制運作的操作和干涉等來探討聯邦體制運作的模式，並在小結部份以「聯邦主義」來比較蘇聯和三位領導人執政時期的聯邦制度各是處於哪種形式。例如是蘇聯時期屬於名爲聯邦，實爲單一國家的中央集權制度，而戈爾巴喬夫所倡導的新聯盟體制是鬆散的邦聯。第六章是結論，筆者將從三方面來進行總結。首先，先就三位領導人的政治改革作一綜合性的介紹，並探討他們的改革把國家帶往哪個方向。再來，筆者將就從三位領導人的執政和政治改革來探討俄國特有的政治文化對其政治發展以及選擇的影響。最後，將就新制度理論中，非制度因素，尤其是領導人的性格、意志等，對制度運行的影響作一探討。

第四節　文獻述評

本節將就學者探討戈爾巴喬夫、葉爾欽、普京三人的行政、立法和聯邦體制改革的著作做一介紹。因爲各家著作實如汗牛充棟，限於本文篇幅和筆者能力，只能以幾本具代表性的作品加以分析介紹。

壹、行政制度改革

一、戈爾巴喬夫

（一）、中文文獻：台灣學者趙春山在其著作「蘇聯領導權力的轉移」中，把戈爾巴喬夫的行政體制改革重點放在他創立蘇聯總統制上面。趙春山認爲戈爾巴喬夫在一直到 1989 年 10 月還反對總統直接民選，因爲蘇聯民主基礎太弱，不能將這麼大的權力集中在一人手中。4 個月後，因爲最高蘇維埃的改組仍無法提供他足夠的權力進行改革，國家大權仍被共黨掌握著，戈氏的黨政分離顯然沒有完全成功。於是他才決定建立總統制來增強本身的權位，並以改革黨組織來爲總統制的實施製造有利的條件。總之，趙春山認爲戈氏的改革主要還是爲了鞏固本身的權力地位，他的社會主義民主概念是爲了動員民眾積極參與政治，在爭取民眾的支持，以穩固他的權力。[9]

台灣學者郭武平在其著作「社會變遷與俄羅斯政治發展模式的選擇」中也談到戈氏的總統制。他認爲戈爾巴喬夫在 1990 年 3 月制定總統制度後，總統和議會都可以監督政府，形成類似法國第五共和的行政雙軌制，在當時蘇聯政黨政治、議會體制和民主素養尚未落實前，會造成憲政制度的紊亂。[10]

大陸學者潘德禮在《蘇聯興亡史論》中提到他的看法。他認爲，戈爾巴喬夫並沒有記取改革的教訓和經驗，沒有正視、檢討這一段工作的問題、缺漏，他仍然堅持急於求成的思維，把一切反對激進改革的人看作反對勢力。戈氏選擇了加快改革速度，逐漸拋棄了蘇維埃制度，照搬西方議會民主制度三權分立的架構，頻繁變動國家權力結構。開始時，要權力由黨歸於蘇維埃，讓人代會和最高蘇維埃

---

[9] 趙春山，**蘇聯領導權力的轉移**(台北：桂冠出版社，民國 79 年)，頁 160。

[10] 郭武平，**社會變遷與俄羅斯政治發展模式的選擇**(台北：國科會研究案，民國 87 年)，頁 61。

成爲國家政權機關，戈氏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之後，爲了鞏固權力、加快改革以及因應政經危機，戈氏又建立總統制，將權力歸於蘇聯總統。這樣的變動造成國家的混亂。而蘇聯總統由於失去共黨的支持而變得無足輕重。[11]

（二）西方學者：Robert T. Huber 和 Donald R. Kelly 在其著作“Perestroika-era Politics: The New Soviet Legislature and Gorbachev’s Political Reforms”中提到對蘇聯總統制的看法。他們認爲，戈爾巴喬夫當時雖然身任最高蘇維埃主席，但在蘇維埃制度下，主席只是虛位元首，只能透過議會或政府間接行使權力，面對當時日益惡化的政經和民族危機，戈氏覺得力不從心。戈氏設立蘇聯總統制的想法，一方面是欲藉此打破舊的國家架構，爲蘇聯政權尋找合法性基礎，一方面是要把權力轉到總統手中並藉以鞏固個人權力地位。[12]

二、葉爾欽

（一）、中文文獻：台灣學者吳玉山在「俄羅斯轉型　1992~1999」一書中談到俄羅斯的行政體制改革，他將重心放在半總統制下總統權力的探討和比較。首先他認爲國家權力的核心就是行政權，因此在討論一國屬於何種政體時，重點就要放在「誰控制了政府」，或是「誰控制了內閣」上面。而半總統制最大的爭議便是究竟是國會還是總統有權力決定總理人選，以控制行政權。從俄羅斯的憲法條文來看，總理由總統提名，而國會擁有總理人選的批准權。從此處來看，俄羅斯好像是屬於半總統制。但接著憲法又規定，國會如果三次否決總統提名的總理人選，總統可以解散國會；所以在俄羅斯，總統才是控制總理的人；而且總理不是向國會負責，乃是直接向總統負責。接著，他就以 93~99 年俄羅斯政府總理頻繁更換的實際事例，來說明俄羅斯總統對政府運作的操作和干涉。吳玉山認爲，俄羅斯總統擁有的權力很大、府會不一致、多黨制，會造成政治極度不穩定。這樣的論點也從葉爾欽執政的期間得到證明。[13]

大陸學者一般的論述認爲，葉爾欽制定的 93 年憲法雖然規定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但俄總統權力過大，造成行政權獨強的局面。陸南泉在期刊《世界經濟與政治》中撰寫的文章「俄羅斯：從葉利欽到普京」就表示，俄羅斯憲法規定三權分立，但葉爾欽實際上實行的卻是“總統極權制”，不少重大決策由葉爾欽一人作出，往往帶有獨裁性質。雖然在轉型過程中，“總統極權制”有其積極作用，但是負面影響卻比較明顯。例如使政府和議會難以發揮作用、嚴重影響三權分立、政治不穩定等。[14]

---

[11] 陸南泉、徐葵、李靜杰　編，**蘇聯興亡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758~760。
[12] Robert T. Huber & Donald R. Kelly, *Perestroika-era Politics: The New Soviet Legislature and Gorbachev's Political Reforms*(N.Y: M.E. Sharpe, Inc.,1991). p.159.
[13] 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台北：五南出版社，民國 89 年)，頁 127。
[14] 陸南泉，「俄羅斯：從葉利欽到普京」，**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6 期(2000 年)，頁 26~27。

（二）、西方學者：學者 Michael McFaul 在期刊“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撰寫的“Post-Communist Politics: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一文談到葉爾欽時期的總統制度，作者認爲，葉爾欽操控著行政機構，爲了強化俄聯邦的高層權力結構，他設計一套行政權力的雙重系統。其一，建立一套類似西方的政府結構。也就是有總理、副總理和部長的政府組織，這些成員由總統提名，經杜馬同意來任命。其二，任命自己的親信來鞏固自身權位。這樣的一味擴張行政權，自然導致府會關係的緊張。[15]

俄羅斯學者 Ю. Е. Федеров 在“Россия: десять вопросов о самом важном”認爲，總統在此體系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他是仲裁者，以保障各族群間的平衡。總統爲了保持內部菁英的穩定，必須能對所有的群體產生影響，並擁有對軍事和國內部門的監督權。同時現今的政體是超級總統制，但是總統實際的權力，在政經生活影響的可能性，比起憲法中規定的全權要少的多。

三、普京

（一）中文文獻：目前在國內缺乏專書來介紹普京的行政體制改革，所以筆者只能多蒐集國內期刊以及中國大陸的書籍和期刊，盡量作一完善的介紹。大陸學者趙龍庚在期刊《和平與發展》中撰寫的文章「普京強化國家權力的方針和措施」提到普京的行政體制改革。他將重點放在普京加強總統權力上，認爲總統集權制有違民主進程。普京時期比葉爾欽更進一步加強總統憲法以外的權力，進一步強化總統職能，這與普京自己再就職典禮時提出要“維護和發展俄國民主”是相違背的。[16]不過大陸學者許志新在期刊《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中撰寫的文章「當前普京新政的特點與走勢」認爲普京加強總統權力可以結束政治紛爭，爲經濟法展創造有利環境，加強行政效率等正面效果。[17]

（二）、西方學者：

俄國歷史學家羅伊．麥德維杰夫（Roy Medvedev）在其著作《普京時代——世紀之交的俄羅斯》中，將普京的行政改革放在他政府人事異動上。2001 年 3 月 28 日，普京簽署了關於在政府強力部門、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機構人事變動的總統令。重要的任命包括：謝爾蓋．伊凡諾夫（Sergei Ivanov）被任命爲國防部長，以及團結黨領導人鮑里斯．格雷茲洛夫被任命爲內政部長；一同宣佈的還包括強力部門幾位副部長的異動。作者認爲，普京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葉爾欽原來的人馬，在他上任一年後，他覺得時機已經是更換葉爾欽班底的成熟時機，來脫離這些葉爾欽親信的制約。[18]

---

[15] Michael McFaul, “Post-Communist Politics: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3, pp.49~50.

[16] 趙龍庚，「普京強化國家權力的方針和措施」，**和平與發展**，第 4 期(2000 年)，頁 27。

[17] 許志新，「當前普京新政的特點與走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第 2 期(2004 年)，頁 3。

[18] 〔俄〕羅伊．麥德維杰夫　著，王桂香　譯，**普京時代——世紀之交的俄羅斯(**北京：世界知

貳、立法體制與政黨政治

一、戈爾巴喬夫

（一）、中文文獻：台灣學者趙春山在期刊《東亞季刊》中所撰寫的文章「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理想與現實」提到戈爾巴喬夫改革議會的原意是想以民意來制衡保守派所控制的共黨權力機構，但並沒有成功。人代會和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不但沒有成爲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助力，反而成爲戈氏加速改革的阻力。[19]大陸學者檀雪菲在期刊《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中所撰寫的文章「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蘇共領導權的喪失」提到戈氏對共黨的改革。作者認爲，戈氏對蘇共的改革爲當時的國家帶來困境，包括：首先，權力重心由蘇共轉向人代會和最高蘇維埃，但是最高蘇維埃無法快速且全面的接收這些權力，使蘇聯原有的統治秩序被打破，造成社會動盪。這樣的權力再分配造成了多重權力重心的局面，議會、共黨、加上總統，使政局更加混亂。第二，蘇共領導地位的喪失使得各加盟共和國沒有統一的控制和管理中心，造成蘇聯的瓦解。檀雪菲認爲戈爾巴喬夫的黨制度改革造成一種無政府狀態，蘇共權力的喪失也進一步造成蘇聯政治改革的失敗。[20]

台灣學者郭武平在其著作《俄羅斯的政黨政治》中對蘇共瓦解的影響有不同的見解，他認爲蘇共瓦解表示黨禁的解除，各式各樣的群眾運動和社會組織開始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也表示蘇聯的政黨政治進入一個新的年代。[21]

大陸學者趙龍庚認爲新制的蘇維埃制度在實行上有四個缺點，包括：１、缺乏明確的權力關係體制；２、蘇聯最高蘇維埃成了發表各種議論的殿堂，使議事缺乏效率；３、最高蘇維埃機關缺乏有效執行法律的機構；４、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權力有限。[22]

（二）、西方學者：學者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W. Curran 在其著作《俄羅斯、蘇聯與其後歷史》中認爲，戈爾巴喬夫改革後的新制蘇維埃議會和差額選舉制度，爲俄羅斯的民主打開一條嶄新的道路。他們說：「這個議會機構有越來越多的自由派反對人士加入，不再是橡皮圖章。」[23]

俄國學者A. C. Чернять在其著作“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ёвым”中說到，戈氏認爲黨是政治領導機構，應該放棄管理職能，黨不能把一切都抓在手中，管理工作、經營工作應由國家機關和其他主管此類事務的單位去做。綜合戈氏對黨的改

識出版社，2001 年)，頁 384。

[19] 趙春山，「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理想與現實」，**東亞季刊**，第 22 卷第 2 期(1990 年)，頁 17。

[20] 檀雪菲，「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蘇共領導權的喪失」，**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第 3 期(2003 年)，頁 117。

[21] 郭武平，**俄羅斯的政黨政治**(台北：五南出版社，民國 88 年)，頁 26。

[22] 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台北：五南出版社，民國 83 年)，頁 211~212。

[23]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W. Curran　著，蔡百銓　譯，**俄羅斯、蘇聯與其後歷史**(台北：國立編譯館，民國 84 年)，頁 1115。

革，就是改變黨直接執政的領導方式。但是戈氏沒有注意到史達林的黨，是無法以民主體系中政黨的型態發展，何況他還要維繫這個保守的機器。[24]

二、葉爾欽

（一）、中文文獻：台灣學者畢英賢在期刊《問題與研究》中所發表的文章「俄羅斯國會改選知研析」中概略地論述 1995 年國會選舉結果、選舉法變革的爭議和主要參選政黨等。畢英賢認為，93 年憲法結束了蘇維埃體制，開創了民主政治新局面。總統擁有強大權力，可以穩定混亂的政局，也可以使改革不會失去方向。但是總統權力過大，而國會卻是反對黨掌控，府會之爭難以避免。

在政黨體系方面，台灣比較缺乏以選舉途徑來研究俄羅斯政黨體系的專門性書籍，學者郭武平在其著作《俄羅斯的政黨政治》中詳細介紹蘇聯末期各種社會組織和運動的發展，以及俄羅斯政黨政治的起源、國家杜馬選舉、各政黨介紹等，是台灣研究選舉制度對俄羅斯政黨運作比較詳盡的專書。但是因為寫作所使用的政黨資料只到 1996 年總統大選為止，對於之後兩次杜馬選舉的資料並未再加以分析，使得政黨發展的研究和預測沒能得到延續，是此書的遺憾之處。

大陸學者黃慶在期刊《東歐中亞研究》中撰寫的文章「總統選舉前的俄羅斯政局」指出，93 年後議會的作用只是一個批評政府一些改革政策的論壇，議會對政府的施政方針很難有實質性的影響。不過另一位大陸學者袁勝育在期刊《國際政治》中所寫的文章「俄羅斯政局回顧與前瞻」認為，雖然新的議會在憲法的權力遭到很大的削弱，議會的職能不如以前那般廣泛，但在分權原則下，它在政治上仍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二）、西方學者：Robert Sharlet 在“The John Marshall Law Review”一書中所撰寫的一篇文章“Reinventing the Russian State Duma: problems of constitutional implementation”認為，93 年憲法所提供的是一個三權不相等的分立，國會對行政的制衡減低；但是他也由車臣戰爭來觀察國會的反應，說明國會雖然沒能成功改變此一政策，卻仍發揮了一定的制衡力。學者 John P. Willerton & Alekcei A. Shulus 在“The John Marshall Law Review”中所撰寫的“Constructing a new Political Process: the Hegemonic Presidency and the Legislature ”認為，俄羅斯時期政治轉變的結果並沒有改變強大的行政主體，總統的法定政治地位高於其他機構，立法體制沒辦法有效制約總統。

Thomas F. Remington 在其編著的書籍“parliaments in Transition”中論到俄羅斯

---

[24] А. С. Чернять,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ёвым(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 группа 《Прогресс》—《Культура》, 1993).
cc. 240~242.

府會的關係。他探討選舉法的變革及對各黨派之間合縱連橫的影響，也分析了影響國家杜馬內政黨角色的因素，並提到黨團、常設委員會等結構。Robert G. Moser 在論文“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Party in Post-Soviet Russia”有談到俄羅斯選舉制度和政治體制對政黨的影響。他認爲俄國憲法太過於強調總統的權力，相對使立法權弱化，加上選舉制的設計，造成俄羅斯少有固定的政黨。

俄國學者：A. B. Логинов所編著的“Российск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и обшественные обьединения на выборах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дума-95”則是介紹俄羅斯 1995 年參選的四十三個政黨以及當時政黨運作和彼此間合縱連橫的情勢，對於筆者描寫 95 年杜馬選舉和政黨政治很有幫助。C. Заславский在“Россия в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м Цикле 1999~2000 Годов”其撰寫的文章“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мн огопартийности и реформа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分析選舉法在多黨制形成的過程中所造成的影響。作者認爲，1993 年國家杜馬選舉所採用的混合制，有利於多黨制的形成，同時也造成許多政黨彼此間意識形態的競爭。

三、普京

（一）、中文文獻：大陸學者劉顯忠和陳愛茹在期刊《俄羅斯研究》中所發表的一篇文章「近年來俄共處境急劇惡化的兩點原因」談到俄共在普京執政後俄共陷入困境的過程和原因。他們認爲原因有：１、普京總統接過了俄共加強社會保護、打擊分離勢力的政策主張，搶走了俄共不少支持者；２、當局採取了許多分化俄共的措施；３、俄共領導未能與時並進，沒能制定出具有廣泛號召力的改革方案和行動綱領；４、對於黨內不同意見者的爭取和團結做得不夠，反而將他們開除黨籍，或是黨員自動退黨。[25]大陸學者萬成才在《中國黨政幹部論壇》中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俄共分裂及其對俄政局的影響」中提到俄共勢力衰弱對俄羅斯政局的影響，包括：１、議會對政府和總統的牽制進一步削弱；２、中右勢力黨派進一步主宰政壇。[26]還有許多大陸學者的文章是介紹 2000 年以及 2003 年杜馬大選的過程、結果、參選政黨以及對政局的影響，例如，胡鍵在期刊《國際展望》中撰寫的文章「國家杜馬，誰執牛耳—俄國家杜馬選舉前各派政治力量的分析」有提到當時政黨的介紹和選舉結果等；鄭羽、龐大鵬在期刊《和平與發展》中所寫的文章「第四屆杜馬選舉及其對俄羅斯政局的影響」特別介紹了統一俄羅斯黨能夠在此次杜馬選舉中獲勝的原因，包括：俄羅斯政治與經濟情況較爲穩定許多，民眾對於政府便恢復了信心，而普京對此「政權黨」的支持也爲其拉抬不少氣勢；其次，自 2003 年由統一俄羅斯黨所發起的反腐敗運動也深獲民心，在「尤科斯事件」(Yukos)等大力打擊金融媒體寡頭的動作之下，普京與統一俄羅斯黨的支持率節節上昇。最後，該黨背後擁有強大的行政資源支持，而這對於其競選工

---

[25] 劉顯忠、陳愛茹，「近年來俄共處境急劇惡化的兩點原因」，**俄羅斯研究**，第 3 期(2002 年)，頁 40～43。

[26] 萬成才，「俄共分裂及其對俄政局的影響」，**中國黨政幹部論壇**，第 9 期(2004 年)，頁 56～57。

作起了相當大的影響力。[27]

（二）、西方學者：Timothy J. Colton 和 Michael McFaul 在期刊“Post-Soviet Affairs”中發表的 “Reinventing Russia’s Party of Power: Unity and the 1999 Duma Election,” 就有談論到普京在 1999 年杜馬大選前所支持的「團結」聯盟，當時，總理普京因車臣戰爭初期成果輝煌而支持率日漸上升，而其又在公眾場合表示以個人身份支持「團結」聯盟，等於是爲其背書，無形之中拉抬了「團結」聯盟的形勢。「團結」聯盟爲克里姆林宮當局所授意成立，即所謂的「政權黨」(Party of Power)。

Edwin Bacon 在書籍“Russian Politics under Putin”中所撰寫的文章“Russia’s Law on Political Parties: democracy by decree”評論了 2001 年政黨法的負面影響，他認爲首先，藉由資助政黨，政府將可能進而操縱政黨，而到最後政黨將失去自主性且成爲國家的傳聲筒；其次，藉由政黨法的頒布，其原意是爲了減去邊緣化和泡沫化的小黨，但是也使得政府有機會利用該法技術性地剝奪某些政黨參加杜馬選舉的權利。[28]

參、聯邦體制

一、戈爾巴喬夫

（一）、中文文獻：台灣學者尹慶耀在其著作《蘇維埃帝國的消亡》中特別談到蘇聯時期的民族問題。他認爲蘇聯錯誤的民族政策造成各民族對俄羅斯民族和蘇聯的仇視，戈爾巴喬夫背負著沉重的包袱上台。戈氏的改革開放使政治控制放鬆而導致各加盟共何國的分離運動，等到戈氏想以新聯盟條約來挽救爲時已晚。尹慶耀認爲聯盟瓦解的悲劇不完全是戈氏造成的，歷史的遺緒是很大的因素，蘇聯到了戈爾巴喬夫時已經病入膏肓，藥石無效。

大陸的學者就因爲意識形態的影響而比較偏向把蘇聯瓦解的責任歸向戈爾巴喬夫。學者潘德禮在《蘇聯興亡史論》中撰寫的第 28 章「民族矛盾——聯盟解體的導火線」談到戈氏對民族問題嚴重缺乏認識，在決定政策時考慮不週，又過於樂觀；等到事態嚴重，戈氏又被自己所倡導的公開、民主所束縛而無法及時解決問題。[29]陸南泉在期刊《東歐中亞研究》中所寫的一篇文章「蘇聯巨變原因研究之進展情況」也偏向將聯盟瓦解歸結爲戈氏的錯誤。不過，劉添才在期刊《今日蘇聯東歐》中所撰寫的文章「蘇聯解體的原因與教訓」提出看法與尹慶耀相似，認爲是蘇聯過去的政策錯誤導致聯盟解體。

---

[27] 鄭羽、龐大鵬，「第四屆杜馬選舉及其對俄羅斯政局的影響」，**和平與發展**，第 1 期(2004 年)，頁 33～34。

[28] Edwin Bacon, “Russia’s Law on Political Parties: democracy by decree”, in Cameron Ross, ed., *Russian Politics under Putin*(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47~49.

[29] 陸南泉、徐葵、李靜杰　編，**蘇聯興亡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802。

（二）西方學者：Stephan Kux 認爲，蘇聯聯盟制度在戈爾巴喬夫時報發危機是因爲：１、蘇聯強大的中央集權制，加上衰弱的聯邦憲法基礎，與缺乏憲法監督的機制，造成中央篡奪共和國的權力。他甚至認爲美國一個村的權力都比蘇聯加盟共何國要大；２、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因爲各種勢力的矛盾和失誤，使得改造工作腳步緩慢，也造成經濟更加衰退。原本差異性就大的各民族更加分裂。３、蘇聯的民主化還沒有建立完善的體制，聯邦的憲法建構也跟不上政治經濟現實狀況的改變，現存的聯邦制度已經不能滿足戈氏改革後所引起的人民的熱誠和要求；４、當人民成爲改變蘇聯的主因時，民族的角色不可被忽略。Stephan Kux 指出，當中央與地方發生衝突時，民族因素總是被簡化甚至歪曲。[30]

二、葉爾欽

（一）中文文獻：台灣學者王定士從克里姆林宮學的角度來觀察葉爾欽時期的車臣政策。他認爲用兵車臣的政策，是出於克里姆林宮在評估國內外情勢互動下而形成的。只有透過克里姆林宮內派系權力鬥爭的觀察，才能掌握政策制定的動向。車臣戰爭失利，使主和派抬頭，葉爾欽也趁機整肅軍方異己來鞏固軍權。[31]台灣學者趙竹成在期刊《國立政治大學學報》中所撰寫的一篇文章「俄羅斯聯邦體制的不對稱性與『韃靼斯坦』模式」提到，俄羅斯的聯邦制度是屬於不對稱聯邦。俄羅斯聯邦體制爲了解決民族問題將聯邦主體的界線和民族界線和而爲一，即屬於不對稱聯邦制。而俄羅斯聯邦制的不對稱表現在民族與區域建制的不平衡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分權上。

大陸學者薛君度認爲，93 年憲法制定後，俄羅斯聯邦主體的地位比蘇聯時期更低，因爲 93 年憲法中將各共和國是主權國家的字眼消除。[32]范建中在期刊《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中所寫的文章「俄羅斯聯邦制度的現實矛盾和未來走向」提到葉爾欽時期聯邦制度的運作。他認爲雙邊分權條約（例如，韃靼條約）雖可在一定程度上緩和聯邦中央和各主體間的關係，遏制了民族分離主義的發展，達到維護國家統一的目的。但是，就長遠來說，這種模式嚴重破壞聯邦憲法的權威、損害聯邦中央的利益，對於俄聯邦制度是有明顯的負面影響。[33]

（二）、西方學者：Steven L. Solnick 在期刊“East Europe Constitutional Review”中發表的一篇文章“Federal Bargaining in Russia”指出，莫斯科中央採用各種雙邊

---

[30] Stephan Kux, *Soviet federalis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0),. pp.2~3.

[31] 王定士，「車臣戰爭之研究：車臣戰爭決策中的克里姆林宮政治因素」，**俄語學報**，第 2 期(1999 年)，頁 232～257。

[32] 薛君度、陸南泉　編著，**新俄羅斯：政治、經濟、外交**(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頁 62～63。

[33] 范建中，「俄羅斯聯邦制度的現實矛盾和未來走向」，**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第 1 期(2004 年)，頁 90。

條約與協議，來解決聯邦主體與中央的問題，不應視爲憲政發展或潛在種族衝突的結果，而應視爲在聯邦政府與地區政權之間，持續進行中的政治議價的產物。他認爲，聯邦中央和地方的鬥爭應被視爲對國家建構完成權力的最終分配而作的議價遊戲。[34]

三、普京

（一）、中文文獻：台灣學者趙竹成在其著作《俄羅斯聯邦體制的憲政基礎及其衝突》中提到他對於普京聯邦體制改革的看法。他認爲，普京的改造計畫最終應會符合普京個人的設計，而在改造完成後，會看到一個全新的「俄羅斯聯邦」。但是，這個新的聯邦是否能體現「聯邦制」在俄羅斯社會的真正意義，卻令人憂慮。憂慮在於，新的聯邦制度就算形式上仍是聯邦制，但是中央權力大幅集中到總統和中央政府身上時，會回到蘇聯時期的聯邦制度：名爲聯邦，實爲中央集權。[35]

大陸學者的重點普遍放在普京對聯邦制度改革的項目上例如學者王立新在期刊《當代世界》中撰寫的文章「普京削藩」說到普京上台後對於紛亂的聯邦制度的改革項目，包括：建立七大聯邦區、改革聯邦委員會的組成原則、頒布命令使總統可以解除地方行政首長的職務等。王正泉在期刊《俄羅斯研究》中所寫的文章「普京與地方勢力的較量」也提出了相似的改革重點。普遍來說，大陸學者認爲葉爾欽時代的聯邦制度改革失敗是俄羅斯國家混亂的原因之一，普金上台後大刀闊斧的改革，有助於維護一統的國家，穩定搖搖欲墜的俄聯邦制度。

（二）、西方學者：Daniel Kempton 在期刊“Europe-Asia Studies”中發表的一篇文章“The Republic of Sakha(Yakutia): The Evolution of 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主張，意識形態與種族差異不過是地方政治菁英們爲了自利的目的，經過理性思考的包裝罷了。Kempton 認爲，相較於事件背後真正的因素，種族爭論常讓人覺得正當多了。因此，沒有追求獨立的地方是因爲，當地菁英考慮到，他們需要莫斯科的貿易和援助；另一方面是考慮到缺乏國際邊界、沒有與外國接壤等。[36]Henry Hale 提到以非俄民族的認同差異與經濟誘因作爲獨立變數，來觀察俄羅斯聯邦地方對中央的態度。如果一個地區對統治他的國家，感受高度的文化和種族差異，再加上有高度的經濟誘因去追求獨立，稱爲分離危機的「觸媒者」(catalyst)；沒有經濟誘因，也沒有種族文化差異，則是繼續留在聯邦內的「整合者」(integrationist)；如有強烈認同差異，但是礙於經濟因素而無法追

---

[34] Steven L. Solnick, “Federal Bargaining in Russia,” *East Europe Constitutional Review*, 1995, pp.52~58.

[35] 趙竹成，**俄羅斯聯邦體制的憲政基礎及其衝突**(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公司，2002 年)，頁 263～264。

[36] Daniel Kempton, “The Republic of Sakha(Yakutia): The Evolution of 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8, No. 4, 1996, pp.588.

求獨立者或是追求獨立的程度較低者，是屬於「騎牆派」（fence-sitter）。因此 Hale 將車臣歸於觸媒者。

俄國學者 Л. Цуканова 在期刊“Новое Время” 中發表的一篇文章“Кремлевская управа”提到，普京能進行聯邦制度的革新，主要還是因爲整個大環境中一般人民的想法，也就是人民支持普京強化中央政府的力量。這種「對自由感到厭倦」的分爲事實上一直因爲經濟不振而伴隨著俄國社會。大部分人民都認爲俄羅斯需要一種垂直的服從性。而這種氣氛反映出俄羅斯在其政治社會思維中根深蒂固的想法。